

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机理、困境及路向

王浩宇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社区教育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有力载体。加快建设高质量社区教育体系并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社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地化视角下的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以“地方性”为内核的社区教育生态重构。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应根植于特定地域的自然、文化与社会脉络,以空间嵌入性、文化调适性与主体协同性三重逻辑,为社区成员提供教育服务。社区教育的资源配置效能偏低、文化传承意识淡薄,以及协同治理机制缺位,这些因素共同阻碍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此,应构筑情境依存的社区教育生态格局,搭建动态平衡的社区教育价值体系,打造协同共生的社区教育治理模式。

【关键词】社区教育; 高质量发展; 学习型社会; 终身学习; 在地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5)12-0021-07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把“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2]。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3]。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已成为人类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与社区生活紧密衔接的教育形态,社区教育是个体社会化学习的有效方式,也是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更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重要载体。加快建设高质量社区教育体系,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社区教育的根本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区教育从自发走向自觉,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统筹、社会力量参与、社区自主实践”的运行机制,构筑了日臻完善的社区教育办学网络。伴随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纵深推进,我国社区教育处在由关注数量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4]。以建设教育强国为目

标,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资源供给悬浮、课程内容同质、主体参与碎片等“离地”壁垒^[5]。社区教育难以因地制宜嵌入地方网络,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肇始于西方国家的在地化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倡导教育应根植于地方的历史底蕴、自然生态、文化背景及产业经济,依托空间、文化与主体三维重构,推动教育实践活动与地方发展深度融合^[6]。在地化视角为破解社区教育“离地化”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新的诠释。鉴于此,本研究以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解析为原点,探究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向,为办好居民“家门口”的社区教育、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阐释。

一、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解析

在地化教育发轫于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乡村学校变革,现已在英国、挪威、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迅速兴起。在地化教育理念源于对“离地化”的标准化教育模式的批判,旨在重建人与自我、人与地方的天然关系。索贝尔(Sobel D.)对在地化教育的内涵释义得到广泛认同并沿用至今。在他看

【收稿日期】2025-05-28

【作者简介】王浩宇(1997—),男,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社区教育研究。

来,“在地化教育是以当地社区和周边环境为起点,教授学生语言艺术、数学、社会研究、科学等课程的过程。它提倡具身实践和在自然社会中学习,聚焦提高学生学业表现,帮助学生增进同社区的互动,并助力其成长为积极的、有贡献的公民。”^[7]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组织(The Rural School and Community Trust)将在地化教育定义为“建基于所在地的历史、生态、文化、经济和文学等基础之上的学习。社区提供学习场域,学生关注社区需求,社区成员成为学校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合作伙伴”^[8]。在地化教育重新审视了地方教育的价值,主张教育实践应根植学习者的生活空间,通过激活地方性知识,推动个体在“一方水土”中实现自我完善。

社区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原初性载体。200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区域利用各类教育资源,开展的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9]。这一官方概念强调,社区教育是在特定地理空间内整合文化、科研、体育等资源,以服务区域建设为导向的教育形态。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指出要“鼓励各地结合当地历史、人文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开展社区教育活动”^[10],强调社区教育要立足社区、建设社区,根植于社区文化脉络。社区教育在自然生态、文化环境及社会网络等层面有其独特性。在地化发展既是社区教育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又是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行性方略。基于此,在地化视角下的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地方性”为内核,以满足社区成员教育需求为目标的社区教育生态重构。

在地化视角重塑了社区教育的价值坐标,并推动社区教育从补充性教育角色转变为赋能社区建设与教育发展的角色。这种转变包含三重理论维度:在认识论层面,社区教育突破“知识复制”的传统模式,升级为以地方经验为基点的知识再生产。如杜威所指,“社会环境无意识地、不设任何目的地发挥着教育和塑造的影响”^[11]。社区教育可以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社区的良性运行。在方法论维度,社区教育立足社区,根据区域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构建“社区即学校”的行动框架。黄炎培提出,“所施教育,须绝对适应本区生活状况……教育内容务须供给其生活需要,扶助其生活改进,才能表现教育的实际效能”^[12]。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

育根植于区域独特的人口结构、文化传统与发展概况。这种地方取向的社区教育目标,旨在形成一种“教育嵌入社区、社区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打造“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新图景。在价值论层面,个体与地方的联接不仅是物质世界中的具身存在,更是精神世界里的意义书写。社区教育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超越工具理性的服务定位,利用社区现有的各类资源,培育具有地方感的社区成员,确保社区教育供给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

社区教育承担着提升社区居民人力资本、改善社区物质环境、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时代重任。在地化视角下的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阐释。其一,办学目标的地方性。社区教育在建设学习型大国、构建技能型社会中的功能属性日益凸显。有别于标准化教育对普适能力的追求,社区教育致力于满足特定社区发展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向社区居民开放,从而提高社区成员素质、改善社区生活环境。有研究指出,高质量的社区教育应关注人的发展新需求,适应社区发展新要求^[13]。其二,课程内容的生态性。社区教育课程开发遵循“地方性知识优先”原则,涵盖社区的地理特征、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等内容,以生动鲜活的社区特色办好让人民满意的社区教育。其三,实践场域的流动性。教学场所打破机构化教育的空间桎梏,以满足社区成员的教育需求。以空间再造实现社区教育资源的全域渗透,如将教育资源延伸至文化礼堂、生态公园等社区公共空间和家庭作坊、小微企业等生产场域,形成“处处可学”的分布式学习网络。其四,时间设计的终身性。社区教育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具有“全员、全面、全程”的基本特征。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应覆盖各年龄段,依据社区居民的生涯发展和生命历程合理设计弹性学制,涵盖学历补偿教育、职业技术训练和生活服务培训等内容,激活居民终身学习意识。

二、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

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教育应以人为本、以社区为根,依托多规格、多内容的教育实践,方便社区居民灵活学习。在地化教育强调教育实践扎根地方具体的空间情境,聚焦教育内容与文化传统及现代文明的动态调适,与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及行业企业等形成协同效应。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应根植于地域生态、文化脉

络与社会网格,以空间嵌入性、文化调适性与主体协同性三重逻辑,为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及不同收入水平的社区成员提供个性化服务。

(一) 空间嵌入: 社区教育根植于地方独特的社会生态系统

空间嵌入揭示了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地方依存性,即社区教育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厚植于地方独特的社会生态系统。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嵌入旨在挖掘优质空间禀赋,推动教育资源实现从“悬浮输入”向“在地生根”的范式转型。其一,地理空间的物质性嵌入。社区内的自然生态、生活场景及实训设备等不仅是社区教育的物理载体,更是社区教育内容生成的核心要素。物质性嵌入要求社区教育根植于地方物理环境,综合考量地域资源的空间布局,通过“场景化教学”将城市工业遗址、手工艺作坊等空间转化为地方知识生产的载体,实现社区教育公共服务效益的最大化。其二,社会空间的关系性嵌入。社区是人类在特定空间中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教育具有鲜明的社区性、群众性和集体性。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权力结构与群体互动直接影响社区教育的效果。社会空间的关系性嵌入强调社区教育需深度介入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学会生存》指出“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的特点的。”^[14]在由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构成的“熟人社会”中,社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突破机构边界,尊重社区成员的认知基础和生活境遇差异,通过社区成员间的亲密关系与社会交往,奠定“人人参与社区教育”的坚实群众基础。其三,符号空间的意义性嵌入。作为“全民终身学习”的公共符号,社区教育以共同的愿景、共享的理念,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提高社区成员的综合素质与生活品质。符号空间的意义嵌入,指社区教育通过价值理念的符号化表达,深植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的过程。社区成员的认知视野从学校教育跃迁至全民教育,深刻感知个体与社区潜在的能动关系。社区成员根据自身职业兴趣、行为习惯等灵活选择学习方式,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二) 文化调适: 社区教育成型于地方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良性互动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文化调适是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内核。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

的‘过去’的投影。”^[15]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理应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地方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其一,社区教育应以本土文化基因为锚点。在地化教育关照文化再生产,挖掘未被标准化知识遮蔽的本土智慧。社区独特的历史底蕴、审美意趣、节庆礼仪等非物质资源,是社区教育意义生成的精神土壤。丹麦现代社区教育创始人柯隆威(Nikolai Frederik Severik Grundtvig)就曾提出,“教育是一种精神的激励和心灵的启迪,目的在于解除思想的束缚,追求个人的发展”^[16]。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扎根地方文化基因,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为各种学习需求创造条件。其二,社区教育应该积极回应地方文化的变迁。以方言习俗、伦理规范、生态智慧及手工技艺等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是社区居民身份认同的核心载体。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面临标准化教育模式的挤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灵活应对现代化冲击,在动态中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赋能地方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如通过代际共学等模式,让老一辈与年轻一代共同探讨文化价值的转化,重塑社区成员文化身份,赋能社区居民在文化变迁中保持主体性。其三,社区教育应该促进文化再生产。社区教育不仅是文化赓续的实践载体,更应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孵化器。将现代文明带来的技术手段与地方文化蕴藏的关系网络相结合,构建更具韧性的社区教育支持系统,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作为地方文化变革引擎,社区教育依托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教育技术、艺术表达相结合,实现地方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共生共荣。

(三) 多元共治: 社区教育建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共生界面

多元共治指向社区教育治理结构的重构。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在《自由的逻辑》中诠释了“多中心”概念,指出多中心结构间的博弈能维护社会秩序。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应突破政府单一主导模式,构建包含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集体的多元共治生态。其一,通过主体赋权激活社区教育的办学自主性。主体赋权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保障社区教育机构、基层组织及社区居民拥有充分决策权。如朗格朗所言,“国家正常运转依赖国家公民作出系统性努力,这就要求社区居民必须通过学习和培训成为社区可依靠的人才”^[17]。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打破“政府主导—社区被动参与”的治理桎梏,通过制度设

计激活社区主体性,满足社区成员的学习需求。其二,通过资源整合构建社区教育协作网络。社区教育资源整合需突破行政壁垒与领域边界,形成“政府统筹、市场调节、社会参与”的供给网络。杜威曾提出,“我们需要工厂主和工会的合作,需要老师和学校当局的合作,需要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慈善家、立法者和有志于阻止正在进行的人力浪费的政治家的合作”^[18]。政府应完善社区教育制度,将社区教育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鼓励开放大学(广播电视台大学)、农业广播电视台学校及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等机构设立社区教育指导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行业企业投资社区教育公益项目。市场机构则通过社会投资,将教育资源嵌入商业生态。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优势,开发小微社区教育项目,填补公共服务领域的空白。其三,通过关系再生产培育社区教育的社会资本。社区教育具有鲜明的跨界属性。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应通过构建信任、互惠的关系网络,联动社区、企业、学校、图书馆及博物馆等多方主体发挥各自优势,以校企合作、校区合作及校际合作等方式,构建起横向联合、纵向沟通的社区教育办学体系,为地方发展积蓄潜在人力资本。

三、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根植于地方生态、文化底蕴与社会脉络,倡导社区教育同当地社会紧密联结。现实境遇中,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困境,难以在国家战略要求、地方发展诉求及个体学习需求间形成稳固张力。

(一) 空间脱嵌: 社区教育的资源配置效能不足

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社区教育与地方空间有机联结,但实践中却普遍存在“物理退场”现象,难以实现社区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与实时共享。其一,社区教育物质资源的悬浮性。当前社区教育资源过度依赖外部输入,其空间布局多遵循行政指令,延续“中心—边缘”的资源配置逻辑。挪威著名建筑理论家诺伯舒茨(Norberg Schulz)谈到,“人的存在意味着‘在大地之上,苍穹之下’,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自然场所,经由对自然场所的理解,人构筑了人为场所”^[19]。目前,社区教育设施与自然禀赋、人口密度及产业结构等要素脱节,无法将地方资源转化为社区教育资本。局限于“空间规训”,“示范校舍”“数字教室”因脱离真实需求而闲置,硬件投入难以转化为实际教学效能。这种“空间错配”源于

自上而下的规划逻辑,忽视了社区需求的地方性表达,造成社区教育资源利用率低下。其二,社区教育的关系网络疏离化。伴随人口结构变迁,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社区结构原子化趋势。我国社区结构正从以信任为核心的“熟人社会”转向以契约为纽带的“陌生人社会”。传统地缘共同体消解,代际共学、邻里互助等教育模式难以为继。社区教育实践未能有效嵌入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社区教育参与率不尽如人意。其三,对社区教育的符号认知存在偏差。有研究指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本逻辑^[20]。教育主管部门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正规教育,且对社区教育存有思维定势偏差,削弱了社区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符号”的公信力。城乡居民对社区教育的理解多停留在“技能培训”的范畴,对社区教育的价值认知有失偏颇。《学会生存》提到,“虽然一个人正在不断地受教育,但他越来越不成为对象,而越来越成为主体了”^[21]。然而,社区教育常被视为政府单向供给的“福利”,社区居民没有与社区产生情感联结,难以形成对社区学习权益的刚性需求。

(二) 文化隔离: 社区教育的文化传承意识淡薄

社区是文化的微型存储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希冀社区教育能成为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载体。但在现实境遇中,社区教育因脱离地方文化生态,面临“传统文化守护”与“现代文明适应”难协调的困境。其一,对地方文化的静态认知。社区教育本应通过“批判性继承”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但部分社区教育者在实践中易陷入“本质主义”误区,将地方文化简化为封闭的静态符号。建基于土地之上的伦理范式及其孕育的与生产、生活节奏相匹配的地方文化不再被城乡居民所依恋。其二,技术理性对地方性知识的挤压。伴随教育数字化强势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社区教育过度依赖在线平台与标准课程,将地方性知识降格为“补充性素材”。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谈到,“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22]。置身现代化空间,部分地区的社区教育机构并未意识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性,为追求绩效可见性,简单移植城市教育模式,将地方性知识降格为“特色补充模块”。技术工具的使用强化了“效率优先”逻辑,使社区教育课程缺乏本土文化元素,社区教育实践丧失了文化浸润所需的情境。其三,社区教育创新与地方文化语境脱

节。文化创新是社区教育应对现代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但实践中的“创新异化”现象值得警惕。许多地方的社区教育忽视乡土知识与地方性经验,以外来文化元素全面置换本土符号,导致教育内容丧失地方辨识度,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低迷^[23]。部分社区为追求“文化吸引力”,将传统节庆改造为商业展演,使其教育功能让位于经济效益,最终消解了社区文化创新的教育意蕴。

(三) 主体模糊: 社区教育的协同治理机制缺位

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缺位的困境。政府部门、基层组织、社区教育机构以及行业企业间缺乏主体联动意识,陷入“有组织无合作”的孤岛效应之中。其一,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模式。现行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多延续“政府规划—机构执行—居民参与”的线性逻辑。社区教育机构和社区居民被定位为社区教育服务的接受者而非共建主体,在政策执行中表现为“象征性参与”。在新制度主义视野下,高度单一化的社区教育办学模式,在组织管理中容易造成权力垄断和资源分配不均,难以满足不同地区的社区教育发展需求,这削弱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内生动力。其二,立体化的权责配置机制存在薄弱之处。社区教育治理多处于教育主管部门“单兵作战”状态,既缺乏垂直维度的政策贯通力,又缺失横向维度的资源整合力。在纵向维度上,国家层面尚未成立具有法定权威的统筹社区教育发展的跨部门协调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未建立清晰的权责划分标准,社区教育政策存在传导的结构性阻滞。县域政府由于行政层级和职能权限的限制,难以深入探索本土化教育模式。在横向维度上,教育主管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缺乏制度化协作平台,无法统筹、协调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系统的专业资源。跨部门联席会议往往流于形式,部分地区社区教育仍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其三,社会组织参与的结构性障碍。早在上世纪,黄炎培先生就曾指出,“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24]在社区教育实践中,社区图书馆、学校场馆与文化站往往分属不同系统,常因安全管理、成本分担等问题与社区产生摩擦。我国社区学院还不具有独立办学资格,对外交流合作意愿不强。部分社区教育机构难以集中协调多方资源,无法激发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参与热情。

四、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向

作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形式,社区教育在提

升全民综合素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应突破资源配置悬浮、文化调适不足及主体协同低效的壁垒,推动社区教育服务地方发展。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及社会组织等应凝聚合力,推动社区教育从“工具性服务”向“根系式赋能”转型。

(一) 构筑情境依存的社区教育生态格局

在地化视角下,社区教育的空间耦合需超越物理空间的简单叠加,通过空间功能的复合化设计,激活地方资源的教育潜能,以满足各类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其一,建立社区教育资源动态调整机制。教育主管部门应摒弃集中式校舍建设模式,研制“需求—资源—服务”动态匹配模型,依据城乡空间肌理构建分布式社区教育机构,促进社区教育资源与地方生态的精准对接^[25]。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应整合人口结构、产业形态、自然禀赋等要素,形成精准化需求画像;通过开发、整合、引进等方式,将村小学旧址、祠堂、集市等生产场域改造为“社区学习角”,形成教育内容与空间功能的深度嵌套。其二,重构社区教育与社会网络的依存关系。教育主管部门应构建“社区—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共同体,设计跨代际、跨群体的协作学习项目,将社区议事会等治理实践转化为学习场景,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如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聚焦打造家门口的精神文化“加油站”,开发了“鲸智”社区教育提升项目,创设多样态的终身学习空间。通过组织“邻里会”“茶话会”,引导社区居民打开“话匣子”,针对社区建设提意见、讲诉求、出主意,以自组织的学习共同体增进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其三,强化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符号认同。教育主管部门应将社区教育纳入地方发展规划,扩大学习资源总体规模,通过政策引导强化社区教育的公共属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应努力丰富社区教育的内容,统筹衔接各类办学形式,真正把学习资源输送到百姓手中,满足社区居民持续增长的学习需求,促使社区居民真正认可、信赖社区教育。

(二) 搭建动态平衡的社区教育价值体系

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植根于“一方水土”的文化脉络,以推进区域内的文化资源整合为突破点,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张力中培育社区教育的文化生命力。其一,研制富有地域特色的社区教育课程。教育主管部门应构建以地方性知识为核心的社区教育内容体系,建设与地方发展和居民生活联系密切的特色课程,动态捕捉社

区的历史记忆、生态智慧与伦理规范。如大连市龙王塘街道明珠社区以非遗文化中的传统烙画为切入点,围绕烙画的历史渊源、基本技法和创作要领等,为社区成员提供学习烙画技艺的平台,在丰富居民业余生活的同时,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二,培育专注于本土文化传承的社区民间团队。已有研究表明,民间团队在社区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6]。县域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应发挥桥梁作用,面向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成员打造一批专注于本土文化传承的社区民间团队,抵制技术理性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县域社区教育指导中心要鼓励、引导社区民间团队为社区输送文化成果,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其中,打通服务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最后一公里”。其三,构建社区文化的数字化赋能机制。教育主管部门应着力构建“数智融合”的社区教育技术应用范式,建立地方文化的数字化转化标准,确保文化创新实践能够服务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既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社区教育效率,又要警惕技术工具主义对地方性知识的消解,防止社区教育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出现文化断裂现象。

(三) 打造协同共生的社区教育治理模式

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激活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构建“制度设计—权责配置—参与机制”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推动社区教育治理结构由行政主导向协同共治转变。其一,建立社区教育协同治理框架。国家层面,构建“中央—省—市—县”四级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体系,整合教育、民政、人社等相关部门资源,组建常设机构,明确教育部门作为统筹协调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其跨部门调度资源与整合政策的法定权限。地方层面,设立社区教育治理委员会,打破行政指令主导的标准化供给模式,建立定期会商、联合督导及信息共享的工作机制,将教育决策权下沉至基层组织。其二,重构社区教育立体化权责配置体系。在纵向治理维度,遵循“中央定标准、省级抓统筹、市县强执行”的原则。中央政府侧重制定国家资格框架与质量评估标准,省级政府负责区域资源规划与跨市协调,区县政府重点建设社区学院与数字化平台。在横向协同维度,建立“教育部门主导、多部门协同、街道统筹”的运作机制,明确各部门的“权力清单”,形成优势互补的供给网络。尤其是要增强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资源整合能力,赋予其统筹辖区教育资源的行政权限。其三,创新社区教育的社会组织参与机制。教育主管部门应

建立社会组织分类准入制度,引进法律咨询、科技普及、健康管理等专业型组织,整合社区学院、企事业单位与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建立社区教育联盟,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获得感。如深圳市南山街道依托龙海文体中心的场地优势,构建区域内亲子阅读和老年教育主阵地,将亲子阅读和老年教育深度融合,营造浓厚的“人人皆学”的全民学习氛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N]. 人民日报, 2021-03-13(1).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 (2025-01-19)[2025-03-0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 [4] 张海定, 陈乃林. 文化引领新时代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J]. 成人教育, 2022, 42(10): 41—47.
- [5] 侯怀银, 宋美霞. 终身教育视野下的社区教育发展: 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12): 16—26.
- [6] 陈时见, 刘雨田. 乡村学校在地化教育的价值与路径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1, 20(5): 75—80.
- [7] Sobel D. Place-Based Education: Connecting Classrooms and Communities [M]. MA: Orion Press, 2004: 7.
- [8] Smith G A, Sobel D. Place-And Community-Based Education in School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3.
- [9]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 [EB/OL]. (2000-04-27) [2025-02-1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004/t20000427_165158.html.
- [10] 教育部, 民政部, 科技部, 等.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 [EB/OL]. (2016-06-28) [2025-02-1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xsh/201607/t20160725_272872.html.
- [11]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23.
- [12] 黄炎培. 黄炎培教育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244.
- [13] 宋亦芳. 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解析 [J]. 职教论坛, 2021, 37(9): 98—106.
- [14] [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 学会生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M]. 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105, 200.
- [15]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 社,1998:44.
- [16]杨应崧.各国社区教育概论 [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86.
- [17]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 [M].周南照,陈树清,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17.
- [18]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七卷 [M].刘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8.
- [19]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 [M].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208.
- [20]贾红彬,张永,钱大海.新阶段农村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困境与进路 [J].教育与职业,2024 (16): 90—96.
- [2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4.
- [23]吴杰.共生理论视角下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的困境与突破 [J].教育与职业,2023 (16): 73—79.
- [24]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 [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44.
- [25]马晓斐,后慧宏.新时代社区教育的空间转向及其实实践理路 [J].成人教育,2025,45 (3): 18—23.
- [26]王凌宇,江小莉,郑逸芳,等.社区教育激发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的路径探析 [J].中国远程教育,2020 (9): 70—75.

Mechanism, Dilemma and Direc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zation

WANG Hao-yu

(Faculty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Community education is a powerful carrier for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and a learning-oriented nation. It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commun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zation, with “localization” as its co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natural,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s of specific regions, and provide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community members with a three-fold logic of spatial embeddedness,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subject coordination. The low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weak awarenes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absenc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ll hind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o this end, a context-dependent ecological patter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a dynamic and balanced value system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 collaborative and symbiotic governance model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hould be created.

【Key words】community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 learning society; lifelong learning; place-based education

(编辑/关永承)